

○全宋文研究資料叢刊之二

宗人年譜集目  
宗編宗人年譜選刊

○巴蜀書社

---

○ 全宋文研究資料叢刊之二 ○

---

宋人年譜集目  
宋編宋人年譜選刊

---

● 吳洪澤 編 ●

---



---

巴蜀書社

---

一九九五年·成都

---

責任編輯:梅錦輝

封面設計:李文金

宋人年譜集目 宋編宋人年譜選刊

吳洪澤 編

巴蜀書社出版發行

(成都鹽道街三號)

廣元南河印制廠制型

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

德陽日報印刷廠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張 22.25 字數 460 千

1995 年 9 月第一版

199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

印數:1—1350 冊

ISBN7-80523-717-4/I·289

定價:40.00 元(精裝)

## 序

編纂《全宋文》，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。一是如何盡可能做到文全，這當然需要把當查的書都翻檢一通，但我們最擔心的是怕漏掉宋人別集。見於著錄的不致漏掉，但也有個別宋人別集未見著錄而實際存世，如南宋理學家錢時的《蜀阜存稿》，在《千頃堂書目》後，公私書目均未見著錄。為防遺漏，為給校點者和審稿者提供方便，我們請沈治宏同志搜集和編纂了《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》，此書現已出版。二是如何寫好作家小傳。臺灣王德毅等先生編的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，搜羅宏富，為我們撰寫作家小傳提供了極大的方便。但入《索引》的多數無文傳世，有文傳世的宋人又有不少未入《索引》。為了解決這一問題，我們除安排人作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》，利用計算機繼續編製各種宋代人名索引外，就請吳洪澤同志收集、研究各種宋人年譜。

近五年來，洪澤同志做了三件有益的工作。一是撰寫了《宋人年譜研究》，對年譜的起源、形成和發展，宋人年譜的各種類型、體例和得失，以及宋人年譜的價值，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。二是編了《宋人年譜集目》，共收譜主一百七十多人，年譜五百七十多種，較之《中國歷代年譜總錄》所收的宋人年譜多二百餘種，對宋代至今所編的宋人年譜，基本上網羅無遺，為宋代文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部非常有用的工具書。三是根據《集目》，複製了一套完整的宋人年譜。除個別手稿還未到手外，其他宋人年譜都有了。這就為我們撰寫作家小傳、從事宋代文化研究，提供了極大的方便。

我們複製宋人年譜，還有一個目的，就是編《宋人年譜叢刊》，除為學術界提供現有的宋人年譜外，還擬新編一些當有而尚缺的宋人年譜。但在目前出版界仍不景氣的情況下，這一設想一時還難以實現。因此，只好先出《宋編宋人年譜選刊》。現存宋人編纂的宋人年譜共有三十多種，為減少篇幅，這裏只收了二十四種，多為珍本。其中一些雖有通行本，但訛脫較甚，故以善本代之。其他十三種比較易得，如三蘇年譜雖為珍本，但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影印出版，故未收入。

《宋編宋人年譜選刊》二十四種，雖僅佔現存宋人年譜的二十分之一，但已五彩繽紛。這裏有一代名臣范仲淹、王安石、李綱，有理學家程頤、呂祖謙、陸九淵，有著名詩人陳與義，著名畫家文同，名僧知禮、大慧普覺禪師，等等。這些年譜的出版，對研究這些政



治家、文學家、畫家、名僧，提供了較為系統、詳實、可靠的資料。宋代是年譜形成的時代，系統讀讀宋人所編的宋人年譜，對研究年譜的體例、類型也是很有價值的。

我相信《宋人年譜集目》和《宋編宋人年譜選刊》的出版，將受到學術界，特別是宋代文化研究者的普遍歡迎。

曾棗莊

1992年4月

（此處為極淡的印文，內容難以辨認，疑似為書籍的序言或目錄部分）

---

# 宋人年譜集目

## 編 例

- 一、《集目》著錄以宋人爲譜主（含由宋入元的譜主）的年譜五百六十餘種，附錄宋人編前朝人年譜五十六種，並附錄有關宋人年譜、生卒方面的考證文章。
- 二、《集目》主要依據歷代藏書目錄、各圖書館目錄卡片、以及報刊論著索引，參考洪煥椿《浙江歷代名賢年譜綜錄》、杭州大學圖書館編《中國歷代人物年譜集目》、楊殿珣《中國歷代年譜總錄》編纂，並盡可能核對原書。
- 三、《集目》按譜主生年先後次序編排，同一譜主下有多種年譜者，則依編者所處時代先後排列。
- 四、對現存年譜，在譜題卷次後注（存），著錄編者及版本。對稿本、抄本及稀見刻本，注明藏書單位（簡稱）。對已佚或存佚情況不明的年譜，亦予以著錄，標明出處，以待考索。

# 前 言

## 一、年譜之體、昉於宋人

兩宋是年譜發展過程中十分重要的階段，作為專用史體，年譜在北宋就已出現，經南宋人的大量編纂，年譜已初具規模了。就所知見的五百五十餘種宋人年譜中，宋人編有八十多種，此外，宋人還編有前朝人年譜五十多種，合計達一百四十餘種。而據各種年譜目錄記載，尚無宋以前人編的年譜。所以，不少學者都認為年譜始於宋代。如清人羅以智云：“唐宋名賢詩文集各有年譜，其體昉於宋人。”（《趙清獻公年譜序》）今人顧廷龍云：“作譜之風，昉於宋，盛於明清。”（《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序》，194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，《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》卷首）這種說法，已為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、《中文大字典》等採用，影響廣泛。來新夏先生認為：“核之年譜實際，確可成為定論。宋代出現一批以韓愈、柳宗元、范仲淹、歐陽修、朱熹等人為譜主的年譜，便是明證。”（《清人年譜的初步研究》，一九八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》，頁五）

不過，也有人認為年譜非自宋代始，而是千百年以來相傳不絕的。如明耿定向云：“粵往吾夫子嘗自述年譜矣，邇於十五志學”，“此非一人一家之譜，蓋堯舜周孔以來相傳譜系，邇之千百載以上而俟之千百載以後者。”（明萬曆刊《耿天臺先生文集》卷十一，《鄒文莊公年譜序》）持此說者，多舉《論語·為政》“十五志學”章為證，如託名元程復心編的《孔子論語年譜》序云：“嘗考得《論語》中十五志學一章，乃孔子自序一生年譜。”（叢書集成初編本《孔子論語年譜》卷首）但孔子講這段話，只是略舉生平學問進益的幾個階段，所謂：“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”並未涉及宦歷行實等年譜必備的內容，又夾雜於語錄之中，並未自成一體，因此，還不是年譜。如果這就算年譜，那麼司馬遷《太史公自序》“年十歲則誦古文，二十而南游江淮”等語，也就成年譜了。不過，“十五志學”章按年歲記事，這與後世自編年譜體例相似，對年譜的形成有一定影響，正如清人吳鏡沅所說：“《論語·為政篇》所載聖人‘志學’一章，即後世自作年譜所起例。”今人則舉雲夢秦簡《編年記》為例，斷言年譜在先秦就已出現。《編年記》用五十三枚竹簡，分上下兩欄，記載了秦統一前後九十年間的軍國大事以及喜這個人物的家事。由于它將國事和私

事雜揉在一起，所以關於《編年記》屬於什麼文體，說法不一。季勳先生認為“有些象後世的年譜”（《雲夢睡虎地秦簡概述》，《文物》1976年第5期）謝巍先生認為《編年記》就是年譜，並更名爲《喜之譜》。高敏先生認為《編年記》是“家譜和墓誌的混合物”，“前半部分象年表，後半部分酷似喜的年譜。”（《〈大事記〉的性質與作者質疑》，197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，《雲夢秦簡初探》，頁14）據馬雍先生考證，《編年記》應分爲前編和後編，以昭王五十三年爲界，昭王五十三年以前記私事的兩條應歸入後編。（《讀雲夢秦簡〈編年記〉書後》，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《雲夢秦簡研究》，頁18）那麼，前編記秦國軍政大事，是秦國的大事年表。後編則記載了喜的經歷及其親屬情況，也記載秦國軍政大事，但不如前編詳盡。後編紀年共三十九條，十條記私事，九條記國事，兩者兼記的有六條，空白十四條。在記私事的十六條中，記喜個人的有九條，記其家屬七人各一條。顯然，後編是以喜爲記事主體，記載其生日時辰，傳的年月，任御史、安陸御史以及從軍的年月等等，基本上是喜個人的編年史，的確與年譜相似。但是後編不過二百餘字，除了對生日、宦歷、家庭成員生卒以及國家大事的記載外，罕及其他；而且對家屬和時事的記載遠遠多於對喜的記載，已到了喧賓奪主的地步。作爲年譜看，其體例還很不完善，還只是年譜雛形。因此，《論語》‘志學’章以及《編年記》只能說明年譜的起源與萌芽，還不能證明年譜在先秦已自成一體。

此後，晉皇甫謐自編《玄晏春秋》三卷，（見《隋書·經籍志》史部雜傳類）皇甫謐號玄晏先生，從書名看，《玄晏春秋》就是皇甫謐個人的編年史，亦即年譜。近人姚振宗認為：“觀此書體例，似用編年法，如後世年譜之類。”（《隋書經籍志考證》卷二十）惜其已佚，難窺全豹。然從殘存於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初學記》等書中的條目可以看出，《玄晏春秋》記事，不僅繫年，而且繫以月日。所記如交游、疾病、言談等等，均爲《編年記》所無。不過，所述多瑣碎，記事多怪異，形似年譜而迹近小說，還不能視爲年譜。

此外，清人袁翼認爲唐代已有年譜，他在《錢辛楣先生年譜序》中說：“唐香山居士白文公，自編長慶前後各集，弁以年譜。”不過，考元稹《白氏長慶集序》、白居易《文集後記》，都僅有白氏自編詩集的記載，而未言及年譜；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提及李璜、何友諒所編，以及自己所編《白文公年譜》，並無白居易自編年譜的記載。袁翼的說法，不知有何依據？

綜上所述，年譜在先秦即已萌芽，但歷魏晉至唐五代，仍未能從編年、紀傳二體中獨立出來，在史林獨樹一幟。因此，通常所謂唐五代以前的年譜，在學術界均有較大的爭議。而自宋以後，年譜的出現已是不容否認的事實，年譜作爲專用體裁，日益受到重視，歷元明清至近現代，年譜量日益增多，遂蔚爲大國了。

那麼，年譜爲什麼在宋代自成一體，並被越來越多的人採用呢？

首先，唐末五代社會動蕩不安，不斷的改朝換代，爲年譜的出現提供了歷史條件。年譜是編年的個人史，是依年月先後臚述個別人物生平事迹的一種傳記體裁。今天所說的年



譜是從編年、紀傳、譜牒等體演變而來的，與唐五代以前的年譜名同而實異。唐五代前的年譜，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的《古來帝王年譜》，《北齊書·宋顯傳》謂宋繪撰有《年譜錄》，《補五代史藝文志》所載曹圭《歷代年譜》等，與鄭樵《通志》所載《年譜》一樣，均系帝王大事年表，旨在記述國家大事，屬於國史。後世年譜則以某一人物為記述主體，兼叙國家大事等。這種記事方法，與編年史特別是正史中帝紀的記事方法類似，只不過記述主體由帝王變為臣民而已。記述對象的轉變，致使其體裁由編年國史轉化為編年私史。而唐末五代不斷的改朝換代，直接促進了這一轉化。例如，編成於宋初的《五王年表》，本是《吳越備史》的一部分，記述吳越五王的生平事迹及吳越史事，前叙世系，後有論贊，類似帝紀。可見，最初本是作為國史編修的，只是後來吳越為宋所滅，其王也成了宋朝的臣民。於是後人便取這一部分題為《五王年表》，並為《中國歷代人物年譜集目》、《中國歷代年譜總錄》等著錄，目之為年譜了。

其次，宋代學術文化的繁榮，特別是史學的空前興盛，為年譜的大量編纂並自成一體創造了條件。年譜是編年的人物傳記，是將編年法應用於人物傳記的產物。自漢荀悅復倡編年體後，編年史雖不斷增多，然直到唐代，編年史仍少於正史，而到宋代，編年著述却大大多於正史。據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著錄：正史類有三十九部，其中宋人所編僅十一部；編年類五十二部，宋人編四十二部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正史類著述共五十七部，編年類則多達一百五十一部。可見，編年史在宋代已較正史更受重視。同時，傳記、譜牒的編撰量也不少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著錄傳記一百六十二種，宋人作一百三十四種；譜牒十九種，宋編七種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傳記四百零一種，譜牒一百一十種。顯然，編年史和人物傳記的大量撰修，有利於將編年法運用於人物傳記，有利於年譜的出現。不僅如此，宋人對年譜“知人論世”的作用已有所認識，如文安體《柳文年譜後序》云：“予以先生文集與唐史參考，為時年譜，庶可知其出處，與夫作文之歲月，得以究其辭力之如何也。”呂大防《韓吏部文公集年譜後記》云：“為年譜以次第其出處歲月，而略見其為文之時，則其歌時傷世、幽憂竊歎之意粲然可觀。”因此，他們在整理前人文集的時候，已不再停留於作序作注或作行狀，而是根據史傳與文集提供的綫索，為作品繫年，並考察作者的歷官出處等，這樣一來，年譜就應運而生了。而且宋人對前人文集往往反復整理，並編纂年譜附集刊行。宋代號稱千家注杜詩，五百家注韓、柳文集，今所知見宋編杜甫年譜有十一種，韓愈九種，白居易八種。所以，隨着文集編注的增多，年譜也愈來愈多。此外，宋人疑古辨偽的學風，也刺激了年譜的編纂。如呂大防編《杜工部詩年譜》後，趙子櫟以其“多疏略”，於是“為訂正而稍補其闕”，又編《杜工部年譜》。和趙氏同時，魯峯也編有《杜工部詩年譜》，以訂正呂氏的錯訛。後來，黃鶴又編《年譜辯證》，考證諸家異同得失。這種辨偽求真的學風，不僅使年譜量大增，而且使年譜體例不斷完善，促進了年譜的自成一體。

第三，宋代學術門戶之爭，也促進了年譜的編纂。章學誠云：“宋人崇尚家學，程朱

弟子次序師說，每用生平年月以爲經緯。”（《劉忠介公年譜序》）爲了光大門戶，增強影響，各派紛紛爲各自的祖師編譜。如尹焞門人黃士毅，朱熹門人李方子，陸九淵門人傅子雲、袁燮等，均爲各自業師編譜。“譜其師說，所以驗其進德始終，學問變化。”（同前）

第四，宋代印刷術的廣泛應用，既擴大了年譜的影響，致使文人學者競相仿作，也使不少年譜得以流傳後世。版刻印行年譜的最早記載，是在宋元豐年間，呂大防刻印杜詩韓文時，即以年譜附集刊行。在此之前的年譜，現存的僅有《五王年表》，其它均湮滅無聞。《五王年表》最初雖以抄本傳世，但在後世已有刻本，如果始終沒有刻本的話，其命運不難想象。自元豐以後，年譜越來越多，或附集刊行，或單獨刻印，南宋魏仲舉更集韓愈年譜三種，刻爲一編，名曰《韓文類譜》。年譜傳世越來越多，影響越來越大，在史籍、文集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載。

自宋以後，目錄書已開始著錄年譜。《郡齋讀書誌》著錄孔宗翰《闕里世系》，卷首有年譜，爲洪興祖所編。《郡齋讀書附誌》著錄有佚名編的《周元公年譜》，張同然編的《橫渠先生張獻公年譜》等，共有七種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著錄有胡仔《孔子編年》、張敦頤《韓文公歷官記》、李方子《紫陽年譜》等單刻本年譜，也著錄了不少附集刊印的年譜。至明祁承燦《澹生堂書目》，已列有“年譜”專目，著錄了《韓文公年譜》等多種。至近代，始有人爲年譜統一編目，如汪間《館藏歷代名人年譜集目》，梁廷燦《年譜考略》，李士濤《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》等。可以說，自宋以來，年譜已在目錄書中取得一席之地，已從編年、紀傳、譜牒等體中逐漸獨立出來，進而自成一體了。

## 二、宋編年譜概述

現存宋人所編年譜，以《五王年表》爲最早。《五王年表》見於《錢氏家乘》，題宋范垞、林禹合編，清錢日煦注，《中國歷代年譜總錄》據以著錄。而《上海圖書館館藏年譜目》、《中國歷代人物年譜集目》則題錢文選編。考《五王年表》後有明錢德洪跋，謂“《五王年表》即靜宣公所刊《吳越備史》之五”。《四庫全書》史部載記類存有《吳越備史》四卷，內容與《五王年表》相同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史部僞史類著錄《吳越備史》十二卷，《遂初堂書目》史部僞史類則有《錢鏐備史》一種。可見，《五王年表》原爲《吳越備史》的一部分，早在宋代就已彙編成帙，只是當時未必稱作《五王年表》。《五王年表》之名，大約始自明代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僞史類還著錄有錢儼《吳越備史遺事》五卷，云：“其序言《備史》亦其所作，託名林范。而遺名墜迹，殊聞異見，闕漏未盡者，復爲是編。時皇宋平南海之二年，吳興西齋序。蓋開寶五年也。”據此，《吳越備史》富爲錢儼所作，成書時間在開寶五年以前，並以抄本傳世。《吳越備史》本是記載吳越國史的，其

中對五王的記載，有世系、生平事迹、國家大事等，後附論贊，類似於紀傳體中的帝紀。後人取這一部分略加補充，題曰《五王年表》，目之為年譜。而《五王年表》從五王生年繫事到卒年，以五王為記述主體，載其世系、字號、里貫、婚姻子嗣、仕履、功業以及褒崇等。兼及時事和同時人的生卒等，屬於編年個人史，已經合乎年譜體例。又經明清人略加補注，於每年下注明譜主年歲。雖然原編者並未把它當作年譜編纂，但視其體例，不少年譜目錄把它作為年譜著錄，還是恰當的。

元豐七年，呂大防編《韓吏部文公集年譜》、《杜工部詩年譜》，為現存最早的文學家年譜。此後，程俱編《韓文公歷官記》，成於崇寧二年。在程氏之前，還有陳傳道編的《韓文公歷官記》，散佚已久。洪興祖編《韓子年譜》，成於宣和七年，洪氏還編有孔子、杜甫年譜，惜其已佚，未知成於何時。趙令時《微之年譜》不知編於何時，但趙氏卒於紹興四年，所編《侯鯖錄》也未提到宣和以後事，因此，載於《侯鯖錄》的《微之年譜》，大約也編於宣和以前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史部傳記類著錄《劉忠肅公行年記》一卷，為劉摯自編，書名蓋後人所題。今其書已佚，但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中還存有部分條目。編於北宋時期的年譜，就我所知見的僅有上述十餘種。除《劉忠肅公行年記》外，均為前朝人年譜，譜主為文學家及大臣。除《五王年表》取材豐富涉及較廣外，其它年譜各有所偏重。《韓文公歷官記》專叙韓愈的宦履；呂大防所編兩種年譜，主要敘述宦歷，間及詩文繫年；《微之年譜》僅考元稹的歷官年歲，並與《鶯鶯傳》相比附。這幾種年譜篇幅短小，敘事極為簡略。洪興祖編《韓子年譜》五卷，於每年下標明歷官所在，並於正文中予以考證，對時事與詩文也有較多的記載，然對其他方面不免忽略。此外，這些年譜系後人為前朝人補編，又多考訂不精，錯誤較多。

南渡以後，年譜編纂日漸興盛，僅建炎元年至慶元六年七十餘年間，便有九十餘種年譜。此後直至南宋滅亡，又有三十多種年譜問世。可見年譜的大量編纂，是在南宋時期。這一時期除繼續為前朝人編譜外，還為本朝人編了多種年譜。除為文學家與大臣編譜外，為理學家編譜之風迅速興起，還為僧人、道士編譜，對譜主範圍有較大突破，年譜取材已較北宋廣泛，表達方式也多種多樣。同時注重考證，史實方面的錯誤明顯減少。因而南宋所編年譜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，都大大優於北宋，對後世的影響也較大。正是經過南宋人的不斷努力，才使年譜自興起後即不斷發展，使年譜體例大致定型。這裏就從譜主、編者、表達方式與編纂體例四個方面談談宋編年譜的基本情況。

## 譜主

宋編一百四十餘種年譜中，共有譜主六十餘人。有的譜主僅一種年譜，有的則多達十餘種。宋人譜主有的既是文學家，又是政治家。因而以他們為譜主的年譜，有的從文學家



角度爲其譜年，有的從政治家角度爲其立傳。如詹大和《王荆文公年譜》從文學家角度爲其譜年，而李燾《王文公年譜》則着重敘述王安石的政治活動等。所以，有關譜主的情況比較複雜，對其歸類也應視具體情況而定。大致說來，宋編年譜的譜主有以下幾種類型。

**文學家** 以文學家爲譜主的年譜有七十多種，占總量的一半。文學家年譜的出現，爲年譜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天地，具有重要意義。章學誠云：“文人之有年譜，前此所無。宋人爲之，頗覺有補於知人論世之學，不僅區區考一人文集已也。”（劉氏嘉業堂刊《章氏遺書》卷八，《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》）這些年譜的譜主，多數是對宋代文學創作頗具影響的人物，影響愈大，年譜愈多。如歐陽修年譜有六種，蘇軾有十種，黃庭堅有四種等。這些年譜大多附集刊行，文集的每一次編刻，往往有新譜問世。這類年譜多屬後人所編，編譜目的有三：一是閱讀或校刊前人文集時，爲了解作品寫作年月與寫作背景而編譜。如呂大防編韓文、杜詩年譜，文安禮編柳文年譜，程子益編蘇軾詩譜，均爲作品繫年。二是爲訂正史書或前人所編年譜。如洪興祖編《韓子年譜》，以期“考歲月之先後，驗前史之是非。”（《韓子年譜序》）吳仁杰編《陶靖節先生年譜》後，張續又作《吳譜辨體》，糾其謬誤。三是鄉人或子孫爲光耀前賢或先人而爲其文集編譜。如陳天麟爲鄉賢梅詢編《許昌梅公年譜》，黃芻爲其祖庭堅編《山谷年譜》。文學家年譜的主要特點是爲作品繫年，兼叙譜主仕宦經歷等。

**學者** 學者年譜有三十多種，皆編於南宋，多屬門人弟子或後學所編。其目的在於考察譜主進學的程序、師友淵源、生徒傳授等，以期擡高業師之地位，光大本門學說。如朱熹爲程頤編《伊川先生年譜》，王柏、李方子等又爲朱熹編譜。宋人爲孔子編譜，可考的有八家，現存的也有兩種。此外，也有譜主後人爲祖先編譜的，如張同然爲其祖張載編譜，陳曄編《古靈先生年譜》。也有譜主所在邑里的郡縣官，出於對譜主的敬仰，爲弘揚其學術思想，有益世教，因而爲之建祠編譜。如魏峙編《直講李先生年譜》，黃去疾編《龜山先生文靖楊公年譜》。這類年譜以敘述譜主的學術交游以及師傳等爲主，並爲學術著作繫年。同時，對譜主的政績，往往有詳細的記載，並以此作爲譜主學術思想有益於社會，有利於治國平天下的力證。學者年譜對於研究譜主思想的形成以及考證作品真偽等，具有重要的價值。

**王公大臣** 王公大臣年譜有二十餘種，多爲譜主家屬或後裔所編。如周倫爲其父周必大編《周益國文忠公年譜》，敘述其業績；岳珂編《岳鄂王行實編年》，爲其祖岳飛鳴冤叫屈等。也有與譜主並無血緣關係，因欽慕其人而爲編譜的。如樓鑰編《范文正公年譜》，李燾爲王安石、司馬光等十餘人編譜等。這類年譜以敘述譜主的政治活動或戰爭進程爲主，對譜主的仕宦經歷、功業等均有詳細記載，同時備載轉官或獎諭誥詞，以及譜主奏議等。

**藝術家** 藝術家年譜祇有幾種，如家誠之《石室先生年譜》，留元剛《顏魯公年譜》等。以敘述仕履或經歷爲主，並爲詩文或碑帖繫年。

**僧人** 僧人年譜僅兩種，編者均爲僧人。《大慧普覺禪師年譜》由宗杲的弟子祖咏所



編，成於咸淳十年，這是現存最早的僧人年譜。譜中記載了宗杲由出生到遁入空門，闡發佛經，徒滿天下等事迹，備載譜主與時人往還贈答之詩文偈頌等，以致卷帙浩繁。此外，還有宗曉編的《尊者年譜》，以引錄資料考證行歷為主，較為簡明。

道士或隱士 以道士為譜主的年譜，如謝守灝編《混元聖紀》九卷，敘述老聃出世以及在歷代顯聖等異事，《太上老君年譜要略》則為該書之節編。此外，王質編有《華陽譜》，敘述了陶宏景的隱居生活。所記多荒誕不經，如記陶宏景出世，謂“母郝氏夢兩天人持爐焚香來前，有娠。今世為君，再世為孫思邈”之類。王質還編有《栗里譜》，佩服陶淵明的高風亮節，把他視為隱君子。

## 編者

編者的情況可分為自編和後人補編兩類。自編年譜僅兩種，一是前所述《劉忠肅公行年記》，一是文天祥《文山紀年錄》。《文山紀年錄》為文天祥在獄中所編，曾經後人補編，刊入文集中。後人補編類又可根據編者與譜主的關係，分為四類：一是子孫所編，如陽少箕、陽炎卯編《字溪先生陽公紀年錄》；一是鄉人所編，如孫汝聽編《三蘇年表》；一是門人弟子所編，如袁燮編《象山先生年譜》；一是他人所編，如度正編《周濂溪先生年表》。這些年譜都在譜主去世後為編年譜，尚無譜主在世時為編年譜的記載。

## 表達方式

宋編年譜的表達方式多為文譜，一些名曰年表的年譜，其實亦是文譜，如度正《濂溪年表》，孫汝聽《蘇穎濱年表》。其次為表譜，只有施宿《東坡先生年譜》一種，以表格的方式，分紀年、時事、出處、詩文四欄為蘇軾譜年。三是詩文目錄附年譜，如任淵注《後山先生詩集》，即於目錄中簡述陳師道的行歷，為詩目編年。四是綱目式年譜，如岳珂《岳鄂王行實編年》，於每年下均提綱挈領地標明主要事迹，然後在正文中詳細記述。

## 編纂體例

宋編年譜除常譜之外，還有專譜與合譜。專譜往往側重於某一方面，如程俱《韓文公歷官記》，專考韓愈的歷官年月。程子益《東坡詩譜》，專為蘇軾詩譜年，“又舉其一時之唱和，與公之追和前人，後人之追和於公者，皆參例而互陳之。”（魏了翁《程氏東坡詩譜序》，《鶴山集》卷五一，四部叢刊本）合譜如何掄《眉陽三蘇先生年譜》，為蘇氏父子三人作譜，稱蘇洵曰老蘇，蘇軾曰先生，蘇轍曰穎濱，以敘述行歷及家事為主。原譜國內久佚，王水照先生從日本搜集回國，並加以整理，編入《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》中，

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。此外還有李燾編《六君子年譜》三卷，為蘇門六君子譜年，當為合譜，惜其已佚，難以考其面貌。宋編年譜主要是常譜，其在選材上已涉及以下內容。

**譜主字號、里貫、世系** 自錢儼《五王年表》已具備此項，但宋編年譜有此內容的隻是少數。或於卷首備述，如洪興祖《韓子年譜》，傅藻《東坡紀年錄》；或於生年下附載，如留元剛《顏魯公年譜》，文天祥《文山紀年錄》。也有一些年譜僅有里貫，如祖咏《大慧普覺禪師年譜》，王質《華陽譜》。家屬或後裔所編年譜，以及附集刊行的年譜，往往既無字號、世系，也無里貫，如李綸《梁溪先生年譜》，岳珂《岳鄂王行實編年》，呂大防《韓吏部文公集年譜》等等。

**科名、仕履或經歷** 仕履或經歷為常譜所必備，自《五王年表》以後諸譜都具備此項。至於進士登科年月，以唐宋人為譜主的年譜，一般都有詳細記載。一些終身無官或很少為官的譜主，其年譜則偏重於詩文創作或學術活動，詳叙其遊歷所至，如魏時《直講李先生年譜》，佚名編《饒雙峰年譜》等。

**功業** 如為政治家譜年，則叙其政治措施，偏重於轉錄奏議之類的文章，如樓鑰《范文正公年譜》等。如為武將譜年，則多叙其戰功，如喬行簡《忠簡公年譜》。宋編年譜多數都具備此項。

**詩文、著述** 文人學者年譜都具備此項，偏詳於詩文和學術著作繫年，如王宗稷《東坡先生年譜》，陳義和《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》。這是宋編年譜的重要內容之一。有些年譜廣引詩文考證譜主行歷，同時起到了為詩文繫年的作用，如王質《栗里譜》。

**家事** 多敘述父輩、兄弟及子侄的情況。宋編年譜對譜主家事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記載，對婚姻、丁憂等記載尤多。家屬或後裔所編年譜，對家庭成員的生卒、仕宦以及譜主對家族的恩蔭等記載尤詳，如周綸《周益國文忠公年譜》，陽少箕《字溪先生陽公紀年錄》等。

**時事** 宋編年譜對時事的記載，往往局限於皇帝即位或駕崩，以及震撼全國的大事件，如安史之亂，靖康之變等。只有施宿《東坡先生年譜》於每年下均列舉時事，尤詳於對王安石變法的記載，這是因為施宿“不僅是為文學家蘇軾譜年，更重要的是為政治家蘇軾立傳”的緣故。（王水照《評久佚重見的施宿東坡先生年譜》，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三年第三輯）

**交游及有關人物的生卒、簡況** 對譜主的交游，多數年譜都有所記載。如李子願《象山先生年譜》記載陸九淵與呂祖謙、朱熹等人的交游問學甚詳。宋編年譜對譜主父母的卒年以及兄弟子侄的生卒等有較多的記載，對其他人物的生卒以及簡況却很少記載。偶爾載及，也是因為譜主為作祭文或哀辭的緣故。

**生前的恩寵和死後的褒恤** 宋編年譜對譜主生前的恩寵都有詳細的記載，往往連轉官譜詞一同載入。對譜主死後的葬時、葬地以及褒贈等，一些年譜也有所記載，如胡柯《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》，鄭良嗣《宣撫資政鄭公年譜》等。李子願編《象山先生年譜》更詳

細記錄時人的祭文、謚議以及建祠、刊刻文集等資料。大多數年譜則止於譜主卒年，而不及身後之事。

附錄 岳珂《岳鄂王行實編年》六卷，前五卷敘述岳飛事迹甚詳，第六卷為《遺事》、《秦國夫人李氏遺事》、《昭雪》、《廟謚》等，實為附錄。不過，宋編年譜有附錄者是罕見的。

以上九項內容，在宋代還沒有一部年譜完全具備，有的甚至只有其中的一至二項。儘管如此，後世年譜中常見的內容，在宋編年譜中都已涉及；後世年譜常用的表達方式以及編纂體例，在宋編年譜中已基本具備。可以說，宋編年譜在體例上已初具規模了。

通過以上對宋編年譜基本面貌的分析，可以明了以下幾點。第一，宋代編纂年譜，顯然受到正史、編年史的影響。如前舉《五王年表》，其體例類似於正史中的帝紀，而後人目之為年譜，這正好說明年譜是雜揉了紀傳、編年二體演變而來的。宋編年譜叙世系遠溯唐堯，而詳於曾祖、祖、父三代，記載家事又詳於父母、兄弟及子侄三代，這與宋人編纂家譜的體例一致，說明年譜曾受到家譜的影響。第二，宋人本着求實精神編纂年譜，年譜中引徵資料佔了不少篇幅。不過，許多年譜編得匆忙，許多事實未及確考，疏略之處仍然很多，這是宋編前朝人年譜的通病。由於年代相距較遠，資料短缺，編譜格外困難，如宋編杜甫年譜十餘種，許多問題依然難以考實；魏了翁曾經感嘆道：“前之為譜者有呂氏，後之為譜者有蔡氏，所以忠於少陵者多矣。然自除官至劍南後事，尚多疏漏。其卒也，或謂在耒陽，或謂在岳陽，或謂在永泰之二年，或謂在大曆之五年。自新舊史列傳以逮二家之編年，俱不能定於一。則其轉徙之靡常，本末之無序，當有未易考者。詩譜之作，殆非易事也。”（《程氏東坡詩譜序》）至於宋人為本朝人編譜，年代相距不遠，許多記載都是耳聞目睹的，較為真實。第三，年譜在宋代雖已自成一體，但宋編年譜不免失之簡略，如趙令時《微之年譜》與鄭良嗣《宣撫資政鄭公年譜》，不足千字，難免遺漏。在宋代雖也有《山谷年譜》、《岳鄂王行實編年》等長篇年譜，然各有所側重，未能全面反映譜主的事跡。因此，年譜在宋代雖有長足的進步，但同後世的年譜相比，還祇是初具規模而已。

### 三、後人編宋人年譜概述

年譜在元明二代繼有所作，至清代已有較大發展，到近現代則更趨完善。今所知見宋人年譜，元人編有十一種，明人編有四十餘種，清人編有一百五十多種，近現代人編有二百七十多種，外國人所編也有幾種。

元明清人所編宋人年譜，在譜主方面具有如下特點。第一，學者年譜占了主要地位，文學家年譜退居其次。元人編有學者年譜四種，文學家年譜僅二種；明人編學者年譜二十餘種，文學家年譜祇有幾種；清人編學者年譜九十多種，文學家年譜僅三十餘種。從年譜



的編纂情況，也可看出當時的學術風尚。理學在元明清被奉為正統思想，於是研究程朱理學的著述層出不窮，為理學家編譜也蔚然成風。對文學家年譜的編纂，反不如宋人那般熱心了。第二，年譜的編纂，多集中於對後世影響巨大的人物，如理學家中的周敦頤、程頤、朱熹，文學家中的蘇軾、黃庭堅等。為朱熹編的年譜多達四十種，約占元明清人所編年譜總量的五分之一。為蘇軾編譜也有十餘種。第三，元明清人所編宋人年譜，譜主為學者、文學家、大臣、藝術家、僧人等，並未打破宋編年譜的範圍，某些方面尚有不及。

在編纂方法上，元明清人采用重編、改編、新編幾種方式，使年譜體例進一步完善。

有不少譜主在宋代已有年譜，元明清人在為他們編譜時，往往在舊譜基礎上，再參考有關文獻，進行改編，改編方式有節編和補編兩種。節編的主要對象是長篇舊譜，如黃芻《山谷年譜》多達三十卷，明陳以志節編為十四卷，清徐名世再次節編為一卷；李子願彙編《象山先生年譜》，明陸氏家祠予以刪節後刻入文集，清方宗誠又作《象山先生年譜節要》；又如清蔡上翔編《王荊公年譜考略》二十八卷，楊希閔以其繁多，節編為四卷等。有的舊譜篇幅並不大，但後人將之刊入其它書中時，往往予以刪節。如《四庫全書》所收《歐陽文忠公集》，便將胡柯所編年譜刪去譜中制詞後錄入；又如清雍正年間修《四川通志》便將王宗稷所編《東坡先生年譜》略加刪節後予以收錄。由於宋編年譜多數都比較簡略，因而後人補編者較多。如朱熹編《伊川先生年譜》，只是約舉大要，因此明清人補編之作共有五種，其中池生春等所編達七卷之多。還有一些是對舊譜訂訛補缺，另成新編。如對王宗稷所編《東坡先生年譜》，明王世貞，清郡長蘅等均在舊譜的基礎上，刪定增補而成新作。總之，不論節編還是補編，都是鑑於舊譜體例未當，因而予以改編，不斷追求體例完善。

也有前人已編有年譜，後編者未能知見，因而重編新譜的。因未參照舊譜，所編年譜與舊譜相較，往往互有得失。如胡柯已編有《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》一卷，並隨文集傳世，清楊希閔却以為：“《歐陽文忠公集》一百五十八卷，竟無年譜，甚以為憾。因上下鈎稽，按年編次，以補此譜。”（《歐陽文忠公年譜序》）又如蔡上翔編《王荊公年譜考略》，以為前此無譜，却不知早在宋代，李燾、詹大和各編有王安石年譜，而詹譜更流傳至今。這種現象的產生，多半是由於年譜傳本稀少，且無人整理編目的緣故。

當然，元明清三代也有不少新編的年譜。這些年譜的編者，多是譜主後裔或後學、鄉人，其編譜目的大致有三。一是譜主後裔為光宗耀祖而編譜，如明葉應友為其祖先葉夢鼎編《葉信公年譜》，清胡培翬為其遠祖胡舜陟編《胡少師年譜》等；一是鄉人或後學為宣揚前賢事迹而編譜，如元張師曾為同鄉先賢梅堯臣編《宛陵先生年譜》，清張大昌等編《王深寧先生年譜》等；一是後人在整理宋人文集時而為編譜，這種情況比較普遍，如清徐炯文編《梅溪王忠文公年譜》，王棻編《杜清獻公年譜》等，均附集刊行。

元明清人所編宋人年譜，取材遠較宋譜廣泛，編纂體例也更趨於一致。如譜主字號、世系、里貫、家事、交游、功業等，已為多數年譜所具備，對時事的記載也較宋普遍。對



譜主身後的褒贈的記載，也較宋為多，往往連譜主在元明清三代受到的崇祀也載入譜中。如清沈涵編《楊龜山先生年譜》，便記錄了明代為楊時建祠崇祀，追封將樂伯等事。清張伯行編《羅豫章先生年譜》，一直記到康熙四十五年賜御書扁額為止。對有關人物的出處始末，往往也有記載，如清秦瀛《重編淮海先生年譜》，即於譜中夾叙有關人物的活動情況。年譜附錄則更為常見，附錄的內容有遺事、言行錄、子嗣，以及後人哀悼或評論譜主的資料。後人補編年譜篇幅也較大，如清王文誥《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》四十五卷，多達六十萬字，可謂長篇巨帙。在清代還出現了一些備受學者推許的年譜，如顧棟高《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》八卷，主張“寧詳勿略，首尾完備”，劉承幹也贊其“舉熙寧、元祐兩朝之事，詳悉無遺，”。（《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序》）又如王懋竑《朱子年譜》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謂：“於朱子平生求端致力之方，考異審同之辨，元元本本，條理分明。”顧廷龍先生云：“尋常年譜，唯詳載一生事迹，或加考證以明原委。至王懋竑撰《朱子年譜》，乃取文集、《語錄》條析而精研之，更博求所述諸儒之緒論，師友之淵源，與夫同志諸儒爭鳴，各家之撰著，曲暢旁通，折衷一是，於是一代思想學說之沿革，俱可窺矣。”（《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序》）

由此可見，年譜在元明清，特別是清代得到進一步完善，使之成為史林中頗具影響的一種體裁。

至於近現代人所編宋人年譜，不僅數量居多，而且在前代年譜的基礎上又前進了一大步。近現代人所編年譜，或發表在刊物上，或單獨印行，也有不少附錄在宋人文集或評傳中。在編譜時，能具體情況具體對待，力求繁簡適中。附編的年譜，多採用表譜的方式，既反映了譜主生平事迹及所處時代背景，又較簡明；單印的年譜，則旁搜博采，反映了譜主生活的各箇方面，全面彙集了研究這一歷史人物的資料。

近現代人所編宋人年譜的譜主，已不再局限於前代的範圍。除編有數量可觀的文學家年譜之外，也編有學者、藝術家、政治家年譜。此外，還編有婦女年譜，如李清照年譜有九種；科學家年譜，如沈括年譜有四種；還有農民起義領袖鍾相和楊么的年譜。這些皆前所未及，體現了近現代學術研究思想的進步和研究範圍的不斷拓展。

在選材上，來新夏先生在《清人年譜的初步研究》中歸納的一般年譜應具備的九項內容，今人所編宋人年譜都已具備，年譜體例已基本完善。

#### 四、宋人年譜的價值

近人朱士嘉認為：“叙一人之道德、學問、事業，纖悉無遺而繫以年月者，謂之年譜。”（《中國歷代人物年譜目錄序》）宋人年譜的首要價值，正在於它詳細彙錄了一百多個歷史人物的生平資料。儘管這些人物在《宋史》以及其它書籍中均有傳記資料，但遠遠不如年